

绪 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跨过了 17 年的历程。十几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领域到科技、教育、文化、政治领域，改革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回顾总结近 20 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市场取向，渐进方式”的道路。

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市场取向，渐进方式”的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说，中国的这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要实现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根本转换。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照搬，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具体说来，则有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基础：

第一，渐进式改革的认识论基础。改革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涉及到每个成员的利益调整，既会在整体上给人民带来利益，也会不同程度地调整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这就要求改革必须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措施的推进有一个过程，社会的理解也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全面推出之前，必须先试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才能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否则在改革过程中将会困难重重，甚至激化矛盾，使改革前功尽弃。

第二，渐进式改革的体制逻辑基础。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是紧密相联的，既需要协调配套，又要选准突破口，一环解一环，最终才能把“死结”打开。从我国十几年改革的实践经验看，改革往往不是首先从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着手，而是从可能性大、容

易攻克的地方实施突破的。例如企业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因此，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外部形成一个竞争的群体，对国有经济形成压力，进而推动国有经济的改革。很难设想，没有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国有经济的改革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第三，渐进式改革的国情基础。人口多、地域广、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低不一，改革的条件和基础也就参差不齐。这就决定了各地方的改革不可能“齐步走”，而只能是有快有慢的“便步走”。这种不平衡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从国情出发，顺应自然、渐进发展的过程。

第四，渐进式改革的政治基础。中国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激进的改革方式必然会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引起社会震荡，最终伤害改革。中国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改革方式的选择必须从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出发。

中国的经济改革，沿着“市场取向、渐进方式”战略拓展，经过近 20 年的演进，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底到 1983 年，是改革的起步阶段，重点是在农村突破取得成功，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第二阶段，从 1984 年到 1988 年，是改革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改革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第三阶段，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是改革的治理、整顿阶段，重点在经济领域中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第四阶段，从 1992 年至今，是改革的深化和攻坚阶段，重点是制度创新，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整体配套改革，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运

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以公有制为主体，全民、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逐渐形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脱离生产力水平、结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被打破，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2. 企业的经营机制正在得到转换，并逐步走向市场。从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入手，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为重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企业改革。在农村，全国 98% 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为主的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一大批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正在转换。

3. 以市场决定价格、价格反映供求，供求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体系正逐步形成。目前，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同时，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信息市场、房地产等要素市场正在迅速发展。

4. 宏观调控体系，已开始由直接行政调控为主，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已越来越大。

5.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分配格局正在出现，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6. 对外开放成为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内地”的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开放格局。

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 9% 的速度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上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瞩目。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重大决

策，把中国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明确中国深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1）建立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2）建立市场规则健全、组织完备、主体行为规范的现代市场体系。（3）转换政府职能、改进宏观调控，建立以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为目的，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为主要手段的宏观经济管理与间接调控体系。（4）建立以社会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中国改革的难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以及个人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三大难点，也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要害所在。

纵观十几年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认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再到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具体而系统地规定了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行动纲领和实施蓝图。这对于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最终取得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指导着改革的深化，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与探索，在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难题。对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有的成就和经验，分析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对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南京政治学院部分理论工作者

和江苏省计经委的实际工作者一道编写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国情出发，把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改革的历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难题、改革的对策。以求对读者了解和投入我国正在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改革事业有所帮助，对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所启发。

本书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从十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书十四章结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到第一章，通过对我国“市场取向，渐进方式”改革历程的回顾，从总体上总结改革的基本经验，分析深化改革的难点和对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二部分，第二章到第十二章从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投资体制、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农村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十一个方面分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第三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科技教育体制、法律制度建设，尽管也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的基本内容，但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科技教育作为一种综合的潜能渗透于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规范，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一般都要专门进行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三个方面的改革，在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前十个方面。

本书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在体系结构上“全”。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在内容阐述上“新”。经济体制诸方面的改革均沿着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

难题与对策编排，突破了传统的内容框架。在方法运用上“活”。把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把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改革理论的源泉在于改革的实践，其作用在于指导推动改革的进程。因此，改革理论研究要契合改革的节拍，抓住难点、热点、重点问题，以提供可行的思路和对策，把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实行定量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是因为从改革的实践看 改革已从浅层转入深层，相应的，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具体；从改革的理论研究看，建设新体制的框架思路已确定，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对操作性程序、方案、政策设计等问题，这就需要形成将这些原则性思路导入实践活动的具体策略与对接措施。这就要求更多地定量分析。同时，由于改革理论研究的具体化，对策研究选择与比较的余地大大拓展了，而尽量降低实施风险与成本的要求，需对解决同一问题提供多种方案。这就需要把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本书由张寿正同志在多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中开设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课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专著和最新科研成果，首先提出体系结构和篇章要目，负责全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并进行最后的统纂合成。参加编写人员及其分工是：

张寿正：绪论、第一章、第二章；

来云龙：第三章、第十二章；

项飞：第九章、第十章；

杜贵阳：第五章、第十一章；

陶向明：第六章、第七章；

焦智立：第四章、第十四章；

桂俊：（江苏省计经委企管处）第八章、第十三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领导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朱凯兵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诚恳的谢意。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这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只是短暂的一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构建，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无现成经验可循；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还知之不多，研究不深。因此，本书无论从体系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还很成熟，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旨在抛砖引玉。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书中粗陋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同仁们斧正。

编 者

1996. 8. 金陵

第一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在党的十四大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比较具体而系统地规定了如何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行动纲领和实施蓝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要突破和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纲领。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与探索，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回顾改革的历程，总结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明确深化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对于经济改革的有效推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大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是 50 年代初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借鉴原苏联的经验、吸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管理经济的做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经济活动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手中，企业没有经营自主决策权，国民经济运行通过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调控，计划的实现主要靠行

政指令和实物调拨，市场作用十分有限；分配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等。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乃至“一五”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发展目标以增强国力和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因而有其适合于我国国情、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它对于当时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用于国家重要建设，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保证人民的温饱需要，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固有弊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而日益暴露出来。

“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①

第一，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企业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客观上否定了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本来必须由它们所管的事又未能管好。由于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间经济联系错综复杂，国家机关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情况的变化，必然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条块分割。传统的经济模式是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管理经济，它们自成体系，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奉行的是“小而全”、“大而全”，各自在封闭的系统内活动，割断了经济的内在联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三，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传统的经济体制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用产品经济的方式管理经济，实行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令性计划，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忽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局部利益，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主要用行政手段贯彻指令性计划，往往造成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和实际相脱节，难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均衡。

第四，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经营好坏与物质利益不挂钩，动力机制大大削弱。

由于上述弊端，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对于传统经济体制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率问题，早在 60 年代初期就有所察觉，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过多次改革的探索。然而，经济改革一直陷于行政性放权、收权，即部门和地方之间管理经济权利的重新划定，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行政机构增减的循环往复之中，从未触及到传统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使经济长期在“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之中徘徊。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经济体制的沿革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七年的历程。在此期间，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8 年底到 1983 年，可以说是改革的起步阶段，重点是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在传统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根源于“赶超”战略内生出的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在现实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是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入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经济激励机制诱发劳

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具体做法是：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试验和探索。

第二阶段，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可以说是改革的扩大和发展阶段。重点是改革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一方面使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在此基础上新生出计划外的资源配置体系，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对初具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为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改革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方面。在这一阶段，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在物资、外汇、金融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促进了整个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使整个国民经济迈了一个大台阶。

第三阶段，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可以说是改革曲折前进的阶段。重点转为治理整顿，由于经过几年高速发展，经济中出现了物价指数上升较高，市场秩序比较混乱，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的现象。在此期间，尽管改革在不同领域有进有退，但总体上进展不是很大。

第四阶段，从 1992 年初至今，以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为发端，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全面深化和攻坚的阶段。重点是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在以压低利率、汇率、紧缺物资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依然如故的情况下放松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固然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的极大混乱。为解决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冲突，改革又深化到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不仅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而且在改革决策上提出了“胆

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的口号^①在这两方面的支持下，各方面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改革，不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使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一）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在原有经济体制下，整个经济的所有制，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国家所有制。如在改革前的 1978 年，我国工业按总产值计算，公有制比重几乎占 100% 其中国家所有制占近 80%，集体所有制占 20%；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在内，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商业按零售额计算，公有制占 97.5%，其中国家所有制占 90.5%，集体所有制占 7%，非公有制的比重也微乎其微。按全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公有制也要占 98% 以上，其中国家所有制占近 60%。到 1993 年 国家所有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43% 左右，在商业零售额中已下降到 40% 左右，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已下降到 1/3 左右。相应地，主要是集体经济的比重大大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人和外资，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至今还只占 10% 左右。这种调整，不但有效增强了经济的活力，扩大了劳动就业的范围，方便了群众生活，繁荣了城乡市场，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完全符合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二）关于企业的经营机制

在原有经济体制模式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包括农村生产经营单位，其经营机制都是由国家或集体统一计划、统

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南巡谈话中提出 并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成为指导改革决策的重要口号。

一分配、统负盈亏。上级主管部门或领导机构有权对企业和基层经营单位，进行直接的指挥和干预，甚至一平二调，但对最终结果都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与责任。企业和基层经营单位没有必要的自主权，生产多少，质量好坏，效益高低，是盈是亏，都可以吃“大锅饭”，其积极性、创造性和生产效率自然不高，在运行过程中损失浪费惊人。改革以来，在农村，已经全面取消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全国 98% 以上的农户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将农村的生产经营权力，基本交给了农民。在此基础上，正逐步推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和逐步建立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同时，大力发展了乡镇企业，并在乡镇企业中普遍实行了以企业为一个独立的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有效经营机制，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城市，虽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普遍有效和基本规范的企业经营机制，但通过多种形式的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使过去完全集中管理的弊病也有了较大改变，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正在深入，企业转机建制正在拓展。

（三）关于市场体系的发展

在原有经济体制模式下，由于我们在理论上对市场的作用甚至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都认为是要被消灭的，对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从根本上也是排斥的；在实践上，对各种产品、资金、土地、外汇的流通和劳动力的流动，实行的基本是统一收购、统一调拨、统一定价和统一分配的办法。因此，整个经济的运行，既没有一种顺畅的渠道和环境，也没有竞争的条件和能力，更无从通过市场的变化，获得调节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及时而准确的信号和信息，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运转效率的提高。改革以来，我们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商品到主要商品，从加工工业品到能源、原材料，逐步减少了指令性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比重，扩大了通过市场调节的范围，把绝大多数产品完全交给市场进行调节。以各类

商品的价格为例，到 1993 年，按全部价值量计算，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的部分超过了 85% 其中农副产品占 85% 以上，工业消费品占 90% 以上，生产资料占 80% 以上。银行存贷款利率已开始根据资金供求状况而变动，外汇汇率已经实现了计划内外不同价格的统一，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在这方面的的发展更快一些，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不但使整个经济的活力明显增加，而且使市场供应的繁荣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四）关于分配关系的调整

在原有经济体制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们实行的基本上是统收统支，全部集中分配。在集体与个人之间，从理论上说是按劳分配，但实际搞的一般都是“三铁、一平、一大”的办法，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现在，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已经在前些年经过第一步改革普遍实行承包上交制的基础上，改为开始实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都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和依法交纳所得税的制度。在集体与个人之间，通过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依靠其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政策的贯彻，使平均主义的分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特别是在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中，过去那种“三铁、一大、一平”的分配办法，已经为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干部能上能下、企业有生有死、收入有高有低所代替。尽管出现了某些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现象，但从全局来看，在改革以前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两亿多群众，现在绝大部分都解决了；即使是收入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和个人，其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较之改革以前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就充分说明，并没有出现所谓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而

是大家都在增长，只不过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共同富裕还是主要的。

（五）关于宏观调控的改革

在原有经济体制模式下，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规定指令性计划，财政无偿拨款、补贴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指示、规定等行政手段进行的，银行基本上处于财政的出纳单位和计划结算单位的地位，金融手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种调控办法，不但主观随意性很大，而且往往脱离实际，效果很差。理论上讲，这是为了保证按比例发展，实际经常发生比例失调。经济形势时胀时缩，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很不稳定。改革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的初步变化和市场范围的迅速扩大发展，不但大大缩小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财政无偿拨款的比重，而且加强了各种经济手段的调控，特别是开始比较重视了金融手段的调控作用。如每年用于生产建设的全部资金，过去依靠计划分配和财政无偿拨款的部分要占 $3/4$ 以上，依靠银行贷款的还不到 $1/4$ 。现在依靠银行贷款和金融市场筹集、以及自有资金的比重，已经上升到 90% 以上。并且在一批大中城市，开放了证券交易市场，在上海和深圳办起了股票市场，全部证券股票的发行总额，累计已超过 5000 亿元。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围绕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和专业银行企业化的深化金融改革方案，已经正式出台。金融手段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六）关于对外经济开放

在原有经济体制模式下，经济发展一般都过份或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企图万事不求人，排斥国际间必不可少的经济交流和取长补短，把对外开放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当成是一种卖国主义的行为来批判。导致经济信

息严重不灵，思想固步自封，技术和管理水平都难以提高和进步。单纯同自己的历史情况纵向比较，似乎进步不小；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往往是差距越来越大，经济中的落后局面，长期摆脱不了。改革以来，我们将闭关锁国的政策，改为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利用国内国外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已经初步从封闭型经济转到了开放型经济，形成了一个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边省区，一直到内地不同层次的开放格局。到 1993 年，已经办起了几万家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引进了几万项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和利用外资达 1,000 亿美元。全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了，进出口贸易总额由过去的 200 多亿美元扩大到 1900 多亿美元，其总值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过去的 10% 左右上升到 40% 左右。特别是在治理整顿的三年中，由于增加出口所带动的部分，占全部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这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我们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才使我国国有经济从 1979 年起，一举扭转到从 50 年代末以来约 20 年徘徊停滞的局面，大幅度加快了发展前进的步伐。如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 1978 年，26 年每年平均递增速度只有 6% 左右，改革后的 17 年提高到 9% 左右，年增长率高了一半。其中，从 1984—1988 年的 5 年，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年均增长率达 11% 以上，比过去 26 年几乎提高了一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人均实际生活水平上升。前 26 年只有 77%，每年平均提高 2.2%，可以说微乎其微；改革以来的十几年共提高了一倍半以上，每年平均提高超过了 6.5%，比过去高了两倍。经济结构也有了一定优化，除轻重工业增长速度由过去过于悬殊到基本持平以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从过去不到 20% 上升到了 28% 左

右。技术进步，也明显加快了，经济增长中依靠技术进步所占的份额，由过去的 10% 多上升到 30% 左右。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上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瞩目。在前几年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严重政治动荡甚至党和国家解体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不仅仍然能够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做到了政治社会安定，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鲜明对比，也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

第二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为什么在过去所有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到现在为止经济改革只有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目前在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看法也不尽一致。如果从整个改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客观地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其比较好的做法和值得对待的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较好地处理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是否必须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或者说，经济改革是否可以先于政治改革而孤立地推进？这是在总结经验时常常容易引起不同看法的一个问题。鉴于有的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大搞所谓的政治改革而带来政治思想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分裂甚至共产党和政府解体的教训，不少人都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先于政治改革，并以中国改革的初步成功为例子来加以证明。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应当充分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打倒了“四人帮”集团、全面总结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的严重政治错误，以及由此造成近 20 年经济“大折腾”的严重教训以后开始的，党中央曾为此专